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
中国文化书院文库 汤一介主编



本色之探

——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

BENSEZHITAN20SHIJIZHONGGUOJIDUJIAOWENHUAXUESHULUNJI

张西平 卓新平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本色之探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

张西平 卓新平 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色之探: 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张西平, 卓新平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10

(20 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汤一介主编)

ISBN 7-5043-2939-8

I. 本… II. ①张… ②卓… III. 基督教-宗教文化-中国-文集 IV. 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3396 号

本色之探——20 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

编 者:	张西平 卓新平
责任编辑:	王 平
责任校对:	陈丹桦
装帧设计:	郭运娟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66093580 66093583 68013201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地矿部保定地质工程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425 (千)
印 张:	18.75
版 次: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43-2939-8/B·68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汤一介

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继先秦、魏晋之后的第三个重要的文化转型时期。我们知道，文化的发展大体总是通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阶段来进行。“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是文化在一定范围内向纵深发展，是对已成模式的进一步开掘，同时表现为对异己力量的排斥和压抑，其作用在于巩固主流文化已经确定的界限与规范，使之得以巩固和凝聚。“离异”则表现为批判和扬弃，即在一定的时期对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怀疑，打乱既成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因而形成对原有的主流文化的冲击乃至颠覆，这种“离异”作用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就是文化转型时期。

在先秦时期，由于周王朝解体，各地诸侯国竞起而引发出“百家争鸣”文化多元发展的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正统儒学的衰落，玄学的兴起和印度佛教的传入，逐步形成对主流文化的怀疑和冲击，并进而造成了文化的多元发展；而二十世纪（或者更早一点）的中国文化又一次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

原因或许更为复杂，其中既有整个民族救亡图存的现实政治需求，又有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全球文明危机所带来的诸多忧虑与困惑。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不仅非常丰富多彩，而且相当深入、相当充分、相当透彻。

在这二十世纪即将过去，二十一世纪即将到来的世纪之交，回顾过去，瞻望未来，在中国文化学术方面有许多事要我们去做。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非常有必要对二十世纪以来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总结。而在我们能对这个世纪的学术文化发展作出合乎实际的、有科学意义的总结之前，对这个世纪以来各个学术流派、各种学术思潮的资料作一番整理工作应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我们组织编选了这套《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由于人力和财力的限制，我们计划分辑陆续编选出版。第一辑四种已于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分别是《国故新知论》，所编选的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的学衡派的论著；《知识与文化》，辑录了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我国学术界颇具影响的张东荪的论著；《走出东方》，所选的是著名学者陈序经有关“全盘西化”的主要论述；《时代之波》，是抗日战争时期闻名一时的战国策派的论集。我们第一辑之所以推出这四本论集，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这几种论集所反映的文化学术思想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但由于种种原因，被人忽视了；二是这几种论集中所辑录的论著在今天已经十分难以见到，给相应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困难；三是这几种论集均围绕着一个论题而展开，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学术系统性，便于研究这一论题的学者利用它们从事研究活动（第一辑编选的四种论集表现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三种不同力量：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当然是属于文化上的激进主义派，学衡派的“国

故新知论”则无疑是属于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派；张东荪的“多元文化论”可以说是文化上的自由主义派；战国策派的“权力意志论”，也许我们可以说它是游离于上述三派之间。这几派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在不同时期都起过不同作用，因此，要全面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走向，对激进主义派、自由主义派和保守主义派都应作认真的研究）。

也是基于这几点考虑，我们这里作为丛书第二辑推出的四本论集，编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宗教界人士的文化学术论著，分别是：《人间关怀》，辑录了佛教界人士的文化学术论著；《本色之探》，是中国基督宗教的文献选编；《追求真宰》，收录了中国伊斯兰教教内人士的主要论著；《超越心性》，选录了道教界人士的文化学术类作品。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多元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界所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不同宗教的教内人士针对现实提出的种种挑战，从各自特有的角度作出了积极有效的回应。佛教界人士致力于佛教的普世化运动，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主张佛教应为现实的人生服务；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积极推进基督宗教的“本色化”和“中国化”运动，力图使中国基督宗教顺应时代潮流，在新形势下获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伊斯兰教教内人士在强调自己独特信仰的同时，非常重视创造性地吸纳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并注意保持教义思想与社会现实的和谐一致；而道教则以超越心性的追求，表达了一种对生命与社会的终极关怀。教内人士的这些文化学术思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参与并推动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几本论集的整理出版，使大家能够充分认识宗教文化学术思想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真切了解教内人士的思维特征和学术思路，体验他们的文化热情与

道德信念。也为学者们的研究活动提供些方便，为今天的中国文化学术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的编选、出版工作是一项很大的工程，在编选、出版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许多学术界同仁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并承蒙许多作者亲属允许使用他们拥有著作权的作品，在此表示感谢。第一、第二辑的出版仅仅是开了一个头，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我们有信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同时也希望继续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支持。

交融与会通（代序）

张西平 卓新平

自公元六三五年（贞观九年），房玄龄受太宗之命于长安西郊迎波斯僧阿罗本进京开始，基督教传入中国已有一千多年。期间，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真正与中国本土文化发生联系，并引起中国基督教本身形态发生变化的只有三次，这就是唐代景教，明末清初之天主教和民国初年的基督宗教^①。

景教在唐代曾受到唐王朝六代皇帝的庇护，一度出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景教所以能一时之昌盛，根本在于“景教传入中国后即极力顺应中国固有之宗教迷信和宿命论思想，不但袭用道、佛二教经典的词语、模型与形式，而且为布教传道的保护方便，简直接受了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的‘尊君’的儒家思想，以代替天主教之教皇至上主义”^②。物极必反，当景教将自身完全融于佛、道之中

① 基督教（Christianity）在中文词义上既包括基督新教也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这在概念的使用上不够准确，因此本文将基督教专指新教，而基督宗教则代表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总称。

② 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页。

时，它自身的独立性就受到了动摇，结果唐武宗禁教令一开，景教便烟消云散了。

明朝末年基督教再次入华。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1年）利玛窦进京定居后，天主教在中国已进入平稳发展之中。利玛窦等人着儒服，戴儒冠，操华语，用汉字著书立说，广交社会名流，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利玛窦在思想层面上，采取“合儒”、“补儒”的策略，努力使天主教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从而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徐光启在谈到此事时说：“余尝谓其教必可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凡世间世外，万事万物之理，叩之无不河悬响答，丝分理解。”^①在其形式层面上，利玛窦接受了中国传统的祭祖祀天尊孔等活动，从而使天主教能为一般老百姓所接受。因而，明末清初天主教真正在中国扎下根，“利玛窦诚为中国开教之功人哉”^②。但随以后的“礼仪之争”，利玛窦路线中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之道被堵塞了。

民国初年，尤其是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基督宗教开始了它第三次大规模地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的运动。这个运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组织形态，而且在其思想价值上无论是对基督宗教本身，还是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民国时期基督宗教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关联，即非基督教运动的兴起和教会人士的积极回应，由此直接促进了基督教的“本色化运动”和天主教的“中国化”进程。非基督教

① 《徐光启集·泰西水法序》。

②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略》，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87页。

运动是 20 年代中国反帝爱国民族运动的一个重要反映,同时亦表现为现代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引入,当时在中国知识界流行的有科学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人文主义、国粹主义等思潮,其思想领域较为突出的理论特点即五四运动之后曾风靡一时的科学实证方法及实证主义哲学。然而非基督教的种种言论则集中在对基督宗教的教会和教义这两个方面的批评,即指责其教会在政治上与西方列强的关联和其教义在思想上与中国文化的隔膜。这些批评一方面引起了基督教界人士护教意义上的回应和反驳,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反思并反省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等问题。早在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成立仅一个月时,中国基督徒简又文、范子美、杨益惠、应元道和邬志坚就发表了《对于非宗教运动宣言》(1922 年 4 月 10 日),而刘廷芳更是以社论形式在《生命月刊》1922 年 3 月号上作出了回应,并在当年的《中国教务杂志》上发表《中国的文艺复兴——基督徒的机会》一文。此外,赵紫宸、张亦镜、罗运炎、徐宝谦、顾子仁、朱立德、谢扶雅、吴雷川、诚静怡等人亦撰文发表其见解。这些文章先后刊登在《青年进步》、《生命月刊》、《真理周刊》、《真光杂志》、《真理与生命》、《文社月刊》、《中华归主运动通告书》等中文版教会杂志和《中国教务杂志》、《中国基督教年鉴》及《北华捷报》等英文版教会杂志上,从而形成民国时期讨论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理论高潮。

中国基督教会的这些领导人和思想家在此已敏锐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中国教会发展所遇到的重要机会。1922 年 5 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由此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始了其意义深远的“本色化运动”。这一运动在思想观念上导致了教会应有何种“本色”及怎样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不同理解

和讨论，在组织体系上促动了教会机构的重组和创新，在政治发展上开始了基督教与西方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脱离关系之尝试，在文教事业上则形成了基督教在华文教事业本色化的努力，如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给华人、以及“中华基督教文字事业促进社”的创立等。这种中国教会“本色之探”的曲折经历，在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的中国基督教文献上得到了集中体现。

五四运动后天主教在华亦推行了“中国化”措施。这种举措除了大量起用中国籍神职人员负责管理教会事务之外，也包括在教义理论上与中国思想文化的沟通和适应。尤其是在宗教思想上，天主教开始了与儒家学说的重新对话，从而打破了自1742年教皇本笃十四世颁布严禁中国礼仪之通谕以来而形成的僵局，回到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交融会通的发展之途。民国时期的天主教与中国文化对话虽不如基督教理论界那样活跃，亦未达到其明末清初时的盛况，却也涌现出马相伯、英敛之、徐宗泽、方豪等关注中西文化之沟通的中国天主教学者，其著述立说从理论层面反映了天主教“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五四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带来的这场关于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大讨论，不仅对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及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直接促进了中国基督宗教本色神学的构建。因此，对这段历史加以回顾、钩稽，对其代表思想进行分析、反思，在人类思想沟通和文化对话上既有历史价值，亦有现实意义。

民国初年中国基督宗教所出现的这场变革活动并不是偶然

的，它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在基督宗教内部所产生的必然反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这自然和宗教精神发生冲突。胡适在谈到基督教时明确地说：“基督教迷信是两千年前的产物。”^①他主张将这种迷信彻底抛掉。蔡元培先生则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这种新思想必然会对基督宗教产生影响，使它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教义，并调整自己和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基督教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极大的灵活性，他们认为新文化运动对基督教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同时也给了基督教一个自证的机会。他们努力寻找基督教与新文化运动的共同点，减少冲突，增加融合。刘廷芳在1921年的一次演讲中就指出，在反对封建迷信，反对阴阳风水、卜筮等方面，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是一致的；在主张平民教育，社会福利上，二者是相通的。新文化运动给了教会一面反省自己的镜子，他认为他们对教会的许多批评并不完全是错的，有许多地方教会是应该加以改正和调整的。所以，他说教会应“从新文化运动，得了一种猛进的精神，起了革新的志愿”^②。

根据1923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年鉴报告，“基督教在全国一千零七十三县中，没有占据的只有一百二十六县，其余都树立了基督教的旗帜”^③。这说明到本世纪初，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政治的侵略，基督宗教作为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样在本世纪20年代，当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觉意识空前高涨，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之时，基

① 胡适《基督教与中国》，《生命月刊》第2卷，第7期。

② 刘廷芳《新文化运动中基督教宣教师的责任》，1921年2月15日《生命》。

③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二集，三联书店，1979年，第61页。

督宗教自然成为其批判的对象。

1922年初，当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于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其第11次大会的消息传出以后，2月7日上海部分青年学生立即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发表宣言，称基督教是“帮助资产阶级掠夺无产阶级，扶持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是各国资本家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先锋队”^①。时隔7日，在北京组成了李大钊、李石曾、范鸿劼、刘仁静等77人签名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并于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的当天，在《北京晨报》上又发表了“非宗教者宣言”。从此，中国非基督教运动兴起，1924年上海非基督教大同盟重新建立，并创办了《非基督教特刊》，提出把每年的12月22日至27日圣诞节前后一周定为“非基督教周”。

在广州，非基督教活动得到了革命政府的支持，随着北伐的胜利，非基督教活动演化为一种暴力活动，不少地方教会的房屋被占，财产被洗劫，教会学校和医院被迫关停，不少外国传教士被驱逐。这个势头在1927年3月北伐军占领南京后达到高潮，南京大学副校长威廉斯博士及其他几名外国传教士被杀，教堂遭到严重破坏。南京事件以后，大批外国传教士开始撤离中国，据统计从1927年1月开始到1927年7月为止，就有近三千多名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还有约三千多人分散在各口岸城市准备随时撤离，而留在内地的外国传教士只剩下500人左右。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差会也认识到沿袭由外国差会决定一切的老路已经不行了，“差会在布道工作中承担大部分责任的时期已在结束”。由此，中国教会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正如1922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的“宣言”中所说的：“在中国基督教运动必

^① 张钦士《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第87页。

先将中国教会放在中央地位，使众人承认教会是第一紧要的机关。”^①这样就基督教来说，“本色教会”就被提到了日程，成为当时基督教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基督教运动已经被卷入到日益兴盛的民族自决意识的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事件使中国教徒感到教会决不能站在民族运动之外，它必须找到一种可以表达自己对那些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政治生活和对外关系以及与社会和家庭习惯有关的大是大非问题的看法”^②。

就天主教来说，在五四运动中，许多天主教徒成为爱国运动的积极分子，天津市的教徒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公教救国团，在《益世报》上发表宣言，号召教内同胞“奋发风云，誓保国土”。几天以后，“天津各天主堂相继组成了公教救国团，他们和天津各界爱国人士一起走上街头，下农村，到处讲演和参加示威游行”^③。

在这种情况下，天主教若要继续维持外国修会决定一切的方针，若要继续把中国作为法国的保教区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被提了上来。1919年11月30日教皇本笃十五世颁布了“*Maximun illud*”通牒，提出了由中国司铎升为主教问题。本笃十五世逝世以后，教皇庇护十一世继续坚持原来的方针，1922年8月9日派罗奥道西亚总主教刚恒毅为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1923年罗马教皇提升中国司铎成和德为湖北省蒲圻主教。从此拉开了中国神甫担任中国各教区主教的序幕。1926年10月28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皇庇护十一世亲自为六名中国籍主教祝圣，这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诚为破天

①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233页，协和书屋，1923年上海版。

② 《1928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第17页。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荒的事”^①。就其实质来说，天主教的“中国化”仍是一个“通过中国人为基督对中国进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②。但这毕竟使中国籍的神甫走向了第一线，中国的主教开始对中国自己的教务有了发言权，这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二

在这次历史性的变革中，中国基督宗教教会内的有识之士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使中国的基督宗教适应这变化了的形势，扭转被动的局面，跟上历史的发展，他们从两个方面做了努力。

首先，将中国基督宗教的改革与民族复兴相联系，将中国基督宗教与社会大的变革潮流融为一体，“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扬东方固有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③。他们要力图在国人面前证明，中国基督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先锋队，也不是资本主义的附属品……”^④。要努力突出中国教会的民族性，与西方教会拉开距离，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国人的赞同。

不但要把中国基督教与“洋教”分开，使其不成民族独立和复兴运动的对象，而且还要指明中国基督教对民族复兴的作用，说明它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贡献。他们认为基督教的这种贡献表现为，民族复兴所要争取的目标就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博爱，而这正是基督教所认为的人类社会的

① 《圣教杂志》1935年第八期。

② 德礼贤《天主教在中国》，第68页。

③ 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真光杂志》二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转引自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268页，1940年上海版。

④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第150页。

最高境界。在社会理想上，基督教与民族利益是一致的，基督教同样主张爱国家、爱民族的精神，它所主张的所谓“无抵抗主义”只是指教徒的个人修养，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表现为宽容和自责，而不是对国家和民族而言的。“尤其是中国正在要求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阶段中，唯有提倡耶稣在当时爱国家民族的精神，使人知所效法。”“在国家民族立场上，基督教决不有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主张……。”^①最重要的在于基督教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一种人格力量的楷模——基督耶稣的人格。因为在这民族复兴的关头，中国要出现自己的领袖人物必须具有两个条件：一是积极有为，有宏大的志向，坚强的节操，勇敢的牺牲精神；二是要严格律身，不为私欲所惑。这两条恰恰都是耶稣的人格特点。因此，在中国发展基督教不但和民族复兴冲突，相反它是有助于民族的复兴，所以基督教的结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就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前途——不但是有它的地位，更将要发生密切的关系，有它特殊的效用，并且当此困难严重的期间，基督教应该当仁不让，为国家，为民族，准备着自己所当负的责任。”^②

其次，将基督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融合。无论是天主教的“中国化”，还是基督教的“本色化”，其核心问题是要解决以基督宗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同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问题。民国初年的中国基督宗教的改革运动其最有文化价值的地方也正在于此。

方豪的《论中西文化传统》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文章。他认为就整个世界文化而言，基督宗教文化与儒家文化是二个最

① 吴雷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版，第150页。

② 同上。

主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这两种文化不但不相悖，而且有着许多共同点。

就宗教思想而言，二者有着许多共同性。许多人认为儒家不是一个宗教派别，孔子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其证据是孔子说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种解释显然是错误的，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并未否认鬼神。孔子说“丘之祷久矣”，又说：“不知天命，无以为君子也。”对匡人他则又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对桓魋则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予何？”孔子还说过：“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说明“孔子乃有宗教信仰，而其宗教信仰固无异于基督教之正宗信仰也”^①。只不过孔子不是一个传教士，而是一个教育家，因而没有留下专门的宗教著作，但其宗教思想是蕴藏在他的言行中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孔子并非只有“内在的超越”，“外在的超越”，天命的崇敬在其心中仍有不可少的位置。

重孝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孝经》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又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儒家认为只有尽孝父母，方能孝天，方能治国，张载《西铭》是一篇典型之作，他把伦理与本体融为一体，把孝与道合一，“乾称父，坤称母。……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同样，天主教所要求的十诫当中有三首诫训人事天主之道，有七首诫训人待人之道，而七诫之中，首要就是要“孝敬父母”。这说明二者在伦理上的一致性，因而方豪认为“孝固我国道德中心，但亦为公教道德中心。

① 方豪《论中西文化传统》，载于《公教与文化》，上智编译馆1947年2月出版。